

科学家精神的形象诠释：愿将此生长报国

■王晖

报告文学《愿将此生长报国》聚焦作为“时代楷模”的5位院士科学家，再现他们的人生和事业、精神与风范，以及由此所凝聚而成的“科学家精神”，昭示着新时代明媚的“科学的春天”。在当下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进程中，这部作品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正当其时。

本书的作者由李春雷、张雅文、陈晓琳、张文欣和杨新英等组成，他们当中既有获得鲁迅文学奖等殊荣的报告文学作家，也有导演和编剧，还有期刊主编和核工业专家。这样一个特殊的组合构成了独特的多元视角，为我们呈现出5位院士科学家的璀璨人生。

在书中，中国工程院院士、植物病理学家朱有勇，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雷达专家刘永坦，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炼油工程技术专家陈俊武，中国工程院院士、核动力专家彭士禄的事迹，给予我们“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等诸多精神力量的启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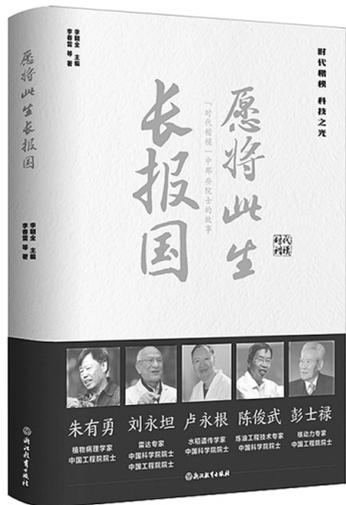
正如本书主编李朝全在书中所说：“时代楷模”科学家既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又是可亲、可敬、可感的普通人，是人可学、人人能学的榜样。

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题材的报告文学，在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徐迟等为代表的报告文学作家，在《哥德巴赫猜想》等作品中生动再现了当代中国的优秀科学家，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书写这一题材的高潮。此后又有许多作家致力于对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进行倾情讲述，涌现出诸多优秀作品，《愿将此生长报国》即是其中的优秀作品。

当下语境中报告文学对于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题材的表现，一方面旨在表明中国正在从科技大国走向科技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逐步变成美好的现实；另一方面深刻印证了作为“时代文体”的报告文学关注现实、再现现实、反思现实的文体指向和基本品格。

二

对于如何表现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



“爱国主义是有关5位院士科学家叙事的一条红线，贯穿于全书各篇。这既是书中所述人物的精神实质和人生境界，也是科学家精神的最重要体现，更是5位作者写作的基本理念。”

《愿将此生长报国》，李朝全主编，李春雷等著，浙江教育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定价：68元

报告文学无疑有着多种路径可循。这部作品有其别样的叙述角度，即5位作家以5章篇幅分别叙述5位院士，看上去是5个独立的个案，但叠加起来则是一个集合，共同指向作品的核心——“愿将此生长报国”。

在作品中，无论是来自贫穷偏远的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朱有勇、成长于北京的福建长乐世代耕读望族之家的陈俊武，还是出身于南京书香门第的刘永坦、香港的中产家庭之子卢永根，抑或是革命英烈的遗孤彭士禄，他们都在各自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同程度地遭遇了铭心刻骨的个人、家庭、社会与时代的种种顺境或逆境的经历，但最终都集中归于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高尚情操与人格风范。

可以说，爱国主义是有关5位院士科学家叙事的一条红线，贯穿于全书各篇。这既是书中所述人物的精神实质和人生境界，也是科学家精神的最重要体现，更是5位作者写作的基本理念。

作品里的院士科学家，在面临人生抉择之时都不约而同选择了“科学可以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却有祖国”的信条，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为国效力。在此，

爱祖国、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成为科学家坚定而执着的信念。

朱有勇婉拒澳大利亚导师的“苦苦挽留”，舍弃绿卡，回国继续攻克农业植物病害难题；刘永坦谨记妈妈“你是中国人，学了本事要回来为国家做事”的嘱托，面对傲慢的英国人，拂袖而去，踏上研制中国自己的新体制雷达之路；“卢永根走上一条他自己选择的路，他仿佛是一个在黑夜里行走的人，追随着前方一束红色的光亮……那束光是他的民族、他的祖国”；烈士遗孤彭士禄，感怀党恩和百姓的养育之情，立志为祖国的核动力事业奉献一生。

在此，爱国主义并不是5位院士科学家嘴上的华丽辞藻或外在装饰，而是镌刻于内心深处的崇高信仰和精神源泉。他们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或者哪一种科学研究，最终都是要汇聚到这个精神高度和品德高度上。从这一点讲，作品再现的5位院士科学家具有高度统一的爱国主义共识，继而凝聚成一种精神品质和人格风范。

在我看来，院士科学家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穿越时空的伟力，是

“时代楷模”的经典内涵，也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定海神针。

三

因篇幅所限，中短篇报告文学欲详尽展开对人物生平事迹的叙述似无可能，因此，集中笔墨再现能够凸显对象性格及命运的人生重要片段或重要事迹，就成为其艺术呈现的主要着力点。

本书里的5篇作品对于人物的再现亦是如此。这些作品鲜明地叙写出人物在其成长阶段的种种磨难、艰辛、彷徨与挫折，更描摹出他们在人生关键时刻的抉择与笃定。这样的叙述，使作品更真实与感人，也更能体现“天降大任”的历史必然、现实需求和时代召唤。

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朱有勇攻克被称为“水稻癌症”的稻瘟病，解决世界难题；研发冬季马铃薯种植技术，让农民脱贫抱“金娃”；拯救三七，纾民之困、解国之难。

“雷达铁军”的领军人物刘永坦少年立志报国，历经多重磨难，以家国情怀铸就人生的脊梁，毕生致力于新体制雷达的研制，核心技术领先世界。

专注野生水稻研究的卢永根，如“一泓清水”般淡泊名利，与妻子共捐800万元积蓄成立教育基金，扶持农业教育事业；立遗嘱捐遗体为医学科研，践行“把一切献给党和祖国”的初心誓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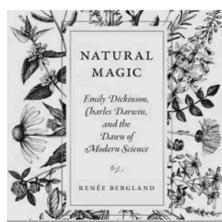
北京大学毕业的陈俊武，奔赴东北追梦石油，助力中国炼油技术傲视全球；以“贡献大于索取，人生就如灿烂”的信念著书立说，培养新人。

革命英烈彭士禄之子彭士禄隐姓埋名研制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设计、建造大亚湾和秦山核电站，成为核动力领域的“拓荒牛”。

这些描述尽显5位院士在各自所长领域的科研攻关和非凡成就，及其对国家昌盛和民族复兴的重要贡献。可以说，作品对科学家人生高光时刻的捕捉与把握，一方面，使得人物形象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具有较强在场感，传达出非虚构叙事的真与实、诚与美；另一方面，以有限而简练的文字，表现出蕴含于人物写实背后的丰富意旨，宽阔、多元而深远。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域外



艾米莉·狄金森(1830—1886)是美国著名诗人，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是载入科学史册的英国生物学家。他俩都生活于19世纪，他们之间会有共性吗？

4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西蒙斯大学文学教授和科学史家Renée Bergland(热内·伯格兰)女士的著作《Natural Magic: Emily Dickinson, Charles Darwin, and the Dawn of Modern Science》(本文作者译为“自然魔力：艾米莉·狄金森、查尔斯·达尔文和现代科学的黎明”)。

伯格兰认为，这两位巨星共同点是，用自己的思想和作品捕捉到了新科学的惊人可能性，同时竭力保留自然之魔力。

在两人诞生的那个时代，研究自然界的学问还不叫“科学”，而叫自然哲学。那时也没有专业科学家，自然哲学是诗人、牧师、女学生等群体的共同业余消遣。19世纪30年代，达尔文乘坐“贝格尔”号考察了太平洋中的加拉帕戈斯群岛，而狄金森是美国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小镇的一名学生。

大约从那时起，世界开始了巨变，诗歌与科学开始相互分离。在此之前，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穆斯·达尔文是一名著名医生、植物学家和博物学家兼诗人，他曾用诗歌阐述科学思想，那时二者是一体的。现代思想家向古老的教条发起挑战，他们提供大胆的新视角，比如进化论是惊悚骇俗的。

正如达尔文在研究中深受其自然哲学根基的影响，坚信所有生命相互关联一样，狄金森的诗歌则被其学习过的植物学、天文学、化学所形塑，她对达尔文的科学思想开辟的迷人可能性非常倾心。

伯格兰独辟蹊径地从全新视角考察这两位不同职业生涯，描绘了19世纪的时代特征，即关于科学的观念迅速演化，诗人、科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都对这一演化过程施加着影响。

她尤其论证了狄金森和达尔文都拒绝接受将科学和艺术分离开。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尤其需要重新找回狄金森和达尔文共有的面对自然生态油然而生的讶异感。

本书连“导言”和“跋”共有18章。《绪言：兰花之心》这个名字是狄金森诗歌中的一个意象。

《导言：迷人的世界》中说：“查尔斯·达尔文没有称

诗人狄金森

与科学家达尔文

■武夷山

自己是科学家。在他年轻时，他不可能称自己为科学家。科学家这个词到19世纪30年代才造出来，那时达尔文还不到30岁。在此之前，研究自然界的入被称为博物学家和自然哲学家。达尔文在“贝格尔”号上的同伴船员认为达尔文是船上的哲学家。他们给达尔文起的绰号是Philos(本文作者注：哲学家一词的头6个字母)。这个绰号并不是指达尔文是高端的思想家，偏好无聊的幻想或异想天开。在当时，自然哲学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实实在在的探究。”

其他各章分别是《狄金森与达尔文：童年画像》《博物学家达尔文：什罗普郡、爱丁堡、剑桥》《自然之人：具有科学色彩的阿默斯特，1830—1836年的阿默斯特》《6岁之前的狄金森》《玩杂耍者、黑马：在贝格尔号上，1832—1836；23—27岁的达尔文》《勇敢的狄金森：阿默斯特，1836—1847；6—16岁的狄金森》《处于领导地位的科学家：伦敦与阿默斯特，1836—1845》《地学宗教，南哈德利：阿默斯特，1847—1851；16—20岁的狄金森》《悠悠的船：道恩镇、莫尔文镇，1842—1851；33—42岁的达尔文》《村里的兴奋：阿默斯特，1851—1857；20—26岁的狄金森》《论物种起源：道恩村，1858—1860；49—51岁的达尔文》《如果你看见一颗子弹(注：狄金森信函中的一个短语)：阿默斯特，1857—1861；26—31岁的狄金森》《狂放实验：道恩镇和阿默斯特，1860—1862》《旋律还是巫术？阿默斯特，1862—1866》《共同的朋友：道恩镇和阿默斯特，1866—1882》《完全无私：达尔文的最后岁月》《大自然是一座闹鬼的房子(注：狄金森的一句诗)：狄金森对死亡》《跋：希望是一种奇异的发明(注：狄金森的一句诗)：狄金森和达尔文在21世纪》。

我与科学出版社

袁亚湘：高端科学专著与优秀科普图书，二者不可或缺

■本报记者 韩扬眉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袁亚湘办公室的书架上，《最优理论与方法》被置于书籍满满的书架中，但袁亚湘一眼便能找到。

这是199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是袁亚湘学术生涯早期撰写的科学专著。黄蓝白封面的硬皮书，内页纸张微黄，但干净平整，袁亚湘将其保存得很好。

从这本书开始，袁亚湘与科学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数十年来，在许多数学家和主要科学类图书出版单位共同推动和努力下，袁亚湘编写和出版了多部数学专著、科普图书，并组织了多套数学丛书，促进了数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和传播。

编辑与学者合作的“典范”

在袁亚湘看来，科学出版是学术成果的记录、传播与共享的重要载体，以及科学精神、思想和方法传播的重要途径。这要求编辑有较高的专业性和敏锐度，精准把握学术前沿。而且，在科学出版领域，编辑和学者应该是朋友，这样双方才能建立互信互助的良好关系。

《最优理论与方法》的责任编辑林鹏，曾担任过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袁亚湘和林鹏在密切合作中建立起的亲密友谊，已成为学者与编辑合作的典范。

1988年8月，袁亚湘学成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原计算中心工作，并在第二年开始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中国科学院大学)讲授《数值线性代数》和《最优方法》。

那时，国内科学专著的种类和数量都不多。1995年，林鹏向袁亚湘发出邀约，请他写一本有关最优理论的科学专著，期望能作为研究生教材，并作为从事计算数学、运筹学等研究的科研人员的参考书。

袁亚湘毫不犹豫答应下来。在之后的一年里，他和南京师范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教授孙文瑜合作课程讲义，《最新前沿进展》等合著了《最优理论与方法》一书。1997年1月，该书正式出版发行。

《最优理论与方法》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无约束最优化、约束最优化和非光滑最优化的理论和计算方法，包括了当时国际上关于优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在“豆瓣”



《数学漫谈》封面。 《最优理论与方法》封面。 《非线性优化计算方法》封面。

网站上，读者留下了这样的点评：“如果学习最优理论的话，这本书是第一选择”“如果学习最优方法，就看这本书”。

与科学出版社的第一次合作，给袁亚湘留下了深刻印象。“编辑向我们约稿后，我们就开始写，过程很简单。”袁亚湘说，“他相信我们，我们也相信他，这是一个彼此相信的过程。”

在袁亚湘看来，互信互助的纯粹态度更有利于图书出版。“编辑向科学家约稿，提前预估或沟通交稿时间后，就要充分相信科学家，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作者。”

从一本书到一套书

良好的合作经历让袁亚湘有了好选题首先会想到科学出版社，比如他曾主动推动了两套丛书的出版。

2008年，国内外运筹学迅猛发展，为了更好地推进国内运筹学学科和科学研究的发展，担任中国运筹学会会长的袁亚湘联系科学出版社，希望能出版一套“运筹与管理科学丛书”。

袁亚湘撰写的《非线性优化计算方法》是丛书的第一本。丛书的其他作者都是各自方向领域的优秀学者，他们贡献了该领域的优秀著作，比如贵州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俞建教授的《博弈论与非线性分析》、上海大学运筹与优化开放实验室主任白延琴教授的《锥优化的基于核函数的内点算法》、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戴虹和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张立卫合著的《最小约束违背优化》等。

“运筹与管理科学丛书”从2008年开始至今，10多年时间已出版了38册，现在还在陆续出版中。作为运筹学、管理科学、应用数学、系统科学、计算机科学等有关专业的参考书，丛书得到了高校师生、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的欢迎和肯定。

近年来，袁亚湘不遗余力地践行和推广科学普及事业。2020年3月14日是首个国际数学节，也被称为“π日”(Pi Day)。为庆祝这一节日，中国数学界组织了一场面向中小学生的网络直播科普讲座，主讲人是袁亚湘，主题为“数学漫谈”。这场报告广受好评，线上听众达50余万人。

“当时有很多青少年提问，包括学不学奥数、刷不刷题等，反响很好。”袁亚湘说。线上报告结束后，科学出版社数学分社的编辑找到袁亚湘，希望他把这场报告扩展成一本数学科普书。

袁亚湘欣然同意：“我经常在大中小学做科普，通常是根据不同阶段、不同兴趣的听众做不一样的PPT，以前我没想过出书，现在出版社找到我，我想可以借机好好整理一下。”

2021年，《数学漫谈》出版，袁亚湘用简单易懂的文字描述了什么是数学，分析了数学的优美结构和趣味性，凸显了数学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附录中还记录了他与网友的交流问答。作为中国科学院学部第三届科学普及

与教育工委委员，在书写过程中，袁亚湘产生了一个想法，希望做一套由不同学科领域的院士主笔的科普丛书，邀请热心科普的院士从大众、学生的视角出发，强化青年人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兴趣，激发探索科学奥秘的热情。

于是，袁亚湘向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提出这一建议并邀请他担任主编。由此促成了“科学走近公众”院士科普丛书的诞生，《数学漫谈》是该丛书的第一本。

弘扬科学精神的重要载体

在袁亚湘看来，科学出版是传播科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和载体之一。“我们那个年代，图书可以说是唯一的知识获取来源，现在网络发达，知识越来越多，但作为科学研究的系统记录，科学出版尤其是高端科学专著依然重要。”

袁亚湘印象最深的是在中国科学院原计算中心读研究生时，读到了数学家华罗庚的专著《指数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导师冯康先生和石钟慈先生合著的《弹性结构的数学理论》等知名学者的专著和译著，以及《从单位圆谈起》等科普书。这些书都出自科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在中国的科学出版领域地位很高。”袁亚湘说。

“科学出版还肩负着科学普及的作用。”袁亚湘表示，“不仅传播科学知识，还要弘扬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让老百姓用科学‘武装’自己。这样，大众就不会轻易被伪科学迷惑，可以更科学、理性地思考和判断问题。”

面对当下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作为作者以及两套丛书的主编，袁亚湘建议从两方面入手。首先，坚持高端的学术水准，出版精品科学专著，提高在高端出版行业领域的竞争力。其次，统筹规划，挖掘国内优秀科普图书，继续推动“科学走近公众”院士科普丛书的出版。同时，注重引进翻译最新的国外优秀科学类图书等，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研究的兴趣。

袁亚湘表示，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知识传播渠道正在发生变化，音视频等电子出版物所占份额将提高，出版行业需要提前做好思考谋划、做好准备，“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荐书



《复原力：心理抗逆力》，[德]丽贝卡·伯姆著，陈依慧译，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9月出版，定价：29.80元

人与人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有些人能够迅速战胜严重的负面经历，甚至可能变得更强大，而另一些人面对小挫折就崩溃了。

在所有经历创伤事件的人中，只有5%到10%的人会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但创伤经历和机会会带来其他后果，如精疲力竭、疲劳综合征、抑郁等。此外，压力和创伤往往还会导致与心理无关的身体健康问题，这是对病情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本书探讨的主要内容是为什么有些人的心理抗逆力比其他人的强，以及如何提高心理素质，即培养心理复原力。(喜平)

心理抗逆力的术语叫作“复原力”，是指一种处理危机并且通过个人能力和资源将危机转化为发展机会的能力。

据调查，人在一生中至少经历一次创伤事件的概率大约在60%至90%之间。这意味着，大多数人都会经历激起我们强烈的情绪反应，且可以被定性为心理创伤的事情。然而，在处理和应对这些事件的方式上，人